



铁血男儿

——孙中山演义

上

庄禹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铁血男儿

—— 孙 立 军 ——

澤存齋託

姜君侯魏輯

總理革命演義

孫科敬題



革命信史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六日蔣中正
題於中山革命演義卷端



孫中山革命
演義

于彥



文獻所存
斯道人口
尊

集賢堂碑字題

中山革命演義

漢民



宣傳之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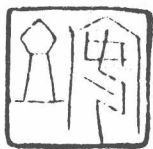
孔祥熙題



德在群庶欣然

景仰民國之父

譚延闓題



序

唐 弢

乡先辈庄禹梅（继良）先生是我父亲最崇拜的对象。我小时家贫，无力上学，父亲典衣卖屋，让我进学校念书。他曾多次告诫，要我认真读书，读好了就像“继良先生”那样，为乡里和社会做些好事。我父亲不识字，虽然和禹梅先生相识，却未必真能理解禹梅先生，他不知道国民党有左派右派，也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勤劳的农民。农民的直觉是官老爷苛捐重税，鱼肉百姓，能为乡民讲公道话反抗官府的便是好人。禹梅先生多次因直言被捕，坚强不屈，他的事迹轰动于周围几百里的乡村，也许就因为这缘故，才引起我父亲由衷的钦佩。并且希望我能向他学习的吧。

我呢，又有我自己的想头。我曾见过禹梅先生一面，那是在古唐小学念三年级的时候，校长庄龙标，绰号“龙头”，是禹梅先生的本家。有一次，他到古唐小学来参观，后面跟着一大批本村的绅士，他看完祠堂（学校设在祠堂里）里悬挂着的匾额和柱子上木雕的对联，少所许可，直到看见偏屋里一块“志洁行方”的匾额（我记得是用不很规则的黄山谷体写的），才说四个字写得不错，而这恰恰是绅士们一向认为书法最差的一块。

禹梅先生走了之后似乎还争论了好几天，所以我留下印象，没有忘记。

不过使我感动的也不是表现了他的独异的这一面之缘。那时盛行武侠小说，青年们几乎人手一编。这种小说既不同于描写男女爱情的“鸳鸯蝴蝶派”，也有异于揭露社会黑幕的所谓谴责小说，有点近于《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一类，但又和《龙图公案》、《彭公案》、《施公案》、《刘公案》（刘墉）等，有个清官贯串全书的“公案小说”迥异，它写的只是活动于江湖上的义士平民，专门抱打不平。武侠小说曾经风行一时。我记得最受欢迎的是《江湖奇侠传》，作者“平江不肖生”，就是写过《留东外史》的向恺然。《江湖奇侠传》因为畅销，写一本出一本，初集、二集、三集、……一直出下去，许多人都等得不耐烦。当时写武侠小说出名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青浦陆士谔，专业中医；别一个是蛟川庄病骸，也就是禹梅先生，著名的新闻记者。他写的武侠小说很多，我至少读过四、五部。有趣的是：这两位武侠小说作者的下一代都是我熟识的新文学家：陆士谔先生的公子笔名海岑，写得一手好散文，他的《秋叶集》曾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禹梅先生的公子是庄启东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和陈君冶合编《春光》，又主编过“新钟丛刊”，收有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王独清的《如此》、穆木天的《平凡集》、李辉英的《再生集》、郭沫若的《历史小品》、王任叔的《三〇集》、雷石榆的《惨别》、庄启东的《自杀者》和我的第二本杂文《海天集》等等。当初自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不过我很爱读禹梅先生以庄病骸名义写的武侠小说，并且以为写侠客的人自己定然也是侠客，白光一道，人头落地，这对十几岁的少年确实是个很大的诱惑。因此父亲要我“学学继良先生”，我便不知天高地厚，一厢情愿，觉得读书“学学继良先生”，那是天经地义，毋须多说的了。

可见我那时对禹梅先生理解的浅薄和无知。

便是现在，我的理解也不见得有多少进展。由于幼时的确读了一些武侠小说，时隔六十几年，这本和那本混淆，这部和那部纠缠，很难将内容梳理出一个头绪来。譬如说他写的《青华碧血录》，我记得是看过的；这回启东兄又将禹梅先生和同乡倪轶池合著的朝鲜痛史《亡国影》的序文（序文用文言，全书用白话）录示，记得我也看过。当时梁启超托名“越南亡命客巢南子”写了《越南亡国史》，又将所著《朝鲜亡国史略》收入《饮冰室全集》，救亡形成一时的风气。《亡国影》者，说朝鲜亡国可以为中国的借鉴也。读序文里说的“李熙非不道之君，而扶余多气节之士，犹且墟社稷失主权以去，则帝制自为，割地以媚人者，几何不逐印度波兰后也！”真可谓一针见血，直刺入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之流的心坎。从《亡国影》、《青华碧血录》等书看来，禹梅先生实际上是借武侠小说之名，行爱国主义之实，他所主张的恰恰是人间正义和社会公道，这和他后来的信仰比较合拍，和一般武侠小说作者相比，已经深入了一步。看了这部孙中山演义——《铁血男儿传》，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信心，增进了我对禹梅先生的钦仰和佩服。

在此之前，我确实不知道他还有这样一部用章回体写的材料丰富的小说。

也许是中国社会性质或者文化传统的关系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不管哪个党派，哪个政治组织，都要依靠帮会的声援和支持，否则就难以存在与发展。我以为这一点《铁血男儿传》是写得非常真实的。就辛亥革命而论，刘揆一、马福益之于华兴会，陶成章、竺绍康之于光复会，郑弼臣、洪鏊之于兴中会，关系都十分密切，当时一提到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等革命组织，几乎无法和哥老会、三合会、天地会等分开；孙中山在香港时，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等三人畅谈革命，兴

高彩烈，且有“四大寇”之称，这是本书第二回中山先生在给郑弼臣信里自己就承认的。小说从广州博济医校同学写起，不久便转入帮会活动，转入“四大寇”的描写，作者对中国秘密社会历史、规章、活动的熟悉，博洽详尽，了如指掌。我过去只知道光复会首领之一陶成章曾有《中国秘密社会史》之作，但也只限于同光复会的关系，禹梅先生了解的内容不仅突破了这个范围，且深入于社会习俗，我以为这是《铁血男儿传》值得称道的第一点。

大凡章回演义小说，重在情节，平铺直叙，只要交代清楚，不必讲究写法。禹梅先生早期作品如《亡国影》，犹不免有这样的弊病。《铁血男儿传》却另辟蹊径，屡变章法，且着重于人物细节的描写。即如第十回写伦敦蒙难：宋芝田之狡诈，马加脱尼（孙中山自述《伦敦被难记》作马凯尼）之阴险，寥寥几笔，跃然纸上。书中叙他托两个西仆送信，以及用信件包裹铜元使劲往窗外街上投掷，都很细致，独不及救他出险的那个关键性的亚美尼亚仆人；到第十一回，犬养义读《泰晤士报》访问记的后半篇，才由孙中山亲口补叙那个为他送信给康德黎的亚美尼亚仆人哥罗（《伦敦被难记》作柯尔，说他将孙中山给他的二十镑钱送还康德黎，并从此辞职不干）的故事。写来错落有致，个性鲜明。还有第二十一回叙“野鸡大王”徐镜吾（一作敬吾），专在福州路青莲阁一带演说革命，滑稽突梯，慷慨淋漓，并私售禁书如《革命军》、《黄帝魂》、《猛回头》、《扬州十日记》、《三十三年落花梦》、《二十世纪大舞台》……等，铺陈事实，情同传奇，人物性情开朗，富有特点，章太炎曾戏称之为鼓上蚤时迁。这类性格描写都是别的章回小说所做不到的，我以为这是《铁血男儿传》值得称道的第二点。

从帮会活动到性格描写，一直到革命事迹的追述，小说的一个长处是真实。真实是艺术的生命。《铁血男儿传》的历史意

义也就在这里。因为它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许多情节还符合于革命的事实。禹梅先生当过孙中山的私人秘书，耳濡目染，又正如书中《凡例》所说：“书中材料，均系十数年征集所得，及随中山先生多年之真革命分子所叙述者，绝非影响无稽之谈。”其中如陆皓东的牺牲，《革命军》的畅销，史坚如之炸督署，徐伯荪之杀恩铭，宋渔父之遇刺，袁世凯之窃国，莫不详尽可靠，有史可据。试检参考材料中如孙文的《伦敦被难记》、邹容的《革命军》、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徐血儿的《宋渔父》、黄毅生的《袁氏盗国记》……等，至今已成孤本珍籍，难于寻觅，有人称《铁血男儿传》为信史，实非过誉。冯自由著有《革命逸史》五集，为治民国史者乐于证引。但其初集出版于1939年6月，第五集出版于1947年11月，后于《铁血男儿传》10年至18年，凡所记述，论证昭然，的确如有些人所说，可以称为信史。我以为这是《铁血男儿传》值得称道的第三个特点。

禹梅先生从事新闻工作，久主笔政，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左派。于1929年在宁波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入囹圄，百折不挠，言论名言，多所散佚。晚年并著有《中国古代史析疑》及《古书新考》等学术著作，所藏金文拓片，至今尚未整理。这部《铁血男儿传》不过偶尔遣兴之作，虽然是章回小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历史记录，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部孙中山传记，如果不是我偏爱的话，我还想补充一句：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一部最好的孙中山传记。

1988年10月8日谨序于北京寓次

1988年1月

跋

关于作者——我的父亲庄禹梅(病骸)生平介绍

庄启东

一、最后一科的秀才

庄禹梅(病骸)(1885—1970)是我的父亲,他本名庄禹梅。乳名继良。我家祖上可谓书香门第,但生活一直很穷困。我的祖父是廪生。父亲四岁丧父、六岁丧母,从小由我曾祖母抚养成人。父亲少年时代一直跟着叔祖父读书。叔祖父是个举人,他向往仕途,认为举人哪有不当官的,当一个知县总没有问题吧。可是由于家穷,没有钱活动,他一直等到死也没有当上官。叔祖父对他的侄子要求很严,写字要很端正,因此,父亲的小楷字练成像铅印字体一样正。读书要求不离《四书》、《五经》,而且要求背得滚瓜烂熟。但父亲却不喜欢读这些书,而喜欢看一些旧小说之类所谓“闲书”。他也喜欢看一些有思想性的文章,他很欣赏黄梨洲等反清的和带有唯物主义思想色彩的作品。他第一次赴考秀才时,举人再三叮嘱他要名列前茅。但是父亲对科举不感兴趣,他认为即使考上举人也不过像曾祖父一样潦倒一生。所以他在考场上为人捉刀,替别人考上秀才而卖钱,把

钱大家吃喝玩乐一番，然后回转家来。叔祖父为此大发脾气，不许他离开家门一步。待父亲十九岁那年，考上了秀才第一名，叔祖父才宽恕了他。这已是最后一科的秀才，以后科举便废除了。

二、开始写作生涯

叔祖父死后，一家重担由父亲挑起来。他只好坐馆（设私塾），或外出教书。

后来在上海办了一所函授学校，想以此维持生活。由于他书生气十足，不会经营，反而赔了很多钱，把家里有限的田地都卖了。于是他开始用“庄病骸”的名字写起武侠章回小说来，以卖稿为生。

我不知道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现在发现的最早的著作，有1915年国华书局出版的章回小说《亡国影》（与倪铁池合著）。以及以后出版的《怪面女侠》、《奸杀奇案》、《青华碧血录》和《铁血男儿传》等等。此外，编纂的有《唐宋元明清稗史秘笈》、《外交思痛录》等。据我的姑丈乌一蝶先生在《铁血男儿传》序言中记载，我父亲所著章回小说有“不下数十种”。但是现在都找不到了。

父亲所写章回小说并不是完全荒诞无稽的。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他在《亡国影》序中说：“是书之作，以韩史为资料，以借镜为宗旨，向之所谓影者。于是乎在国人读是书而恍然大悟，发奋以有为也。”他的写作态度也不是完全随心所欲，任意瞎编，他在《怪面女侠》后记中写道：“此事乃得知旅鲁归客者十七八，点缀者十二三，非尽无征也。”其实，父亲写侠客之类小说，无非是幻想由侠客人物来铲除人间的一切不平 and 冤屈。

他也崇拜所谓“新学”，热爱自然科学。他于1904年20岁

时，就在他考取秀才后一年，为了钻研自然科学，他进入上海理科学学校学习。以后曾在大市堰的濬智学堂、杨王的知新学堂等新学堂教过书；还在镇海中学当过理化教师。这科学对于他的反封建思想和他的创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他写《铁血男儿传》（1927年初版定名《孙中山演义》，1929年重版，1931年三版改名为《铁血男儿传》）的时候，从数十年征集所得之材料，百余种参考书籍，及可靠的珍抄本中，根据详尽历史事实，“共疑似者宁缺无滥”写成一百回小说。写作方法比较科学。

自《铁血男儿传》以后，他不再写章回小说了。三十年代时，虽经王任叔（巴人）同志几次鼓励父亲用现实的题材来写章回小说，他也没有写。他这时候，对社会科学感到兴趣。他曾经用庄平青笔名写过一本《社会的进化》（上海乐华书局出版），编辑和标点过内忧外患历史丛书之一《烈皇小识》与《研堂见闻杂记》，并写了一篇试用唯物史观见地评介这两部书的长序。（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三、孙中山的私人秘书

父亲是很崇拜孙中山先生的。他除了写《铁血男儿传》以外，曾于孙中山先生从绍兴、宁波到普陀山视察中，一度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私人秘书。孙中山先生这次旅途的讲演，都由他记录，整理后发表。到现在，宁波市政协还保存着这稿子。

孙中山先生在旅途中，和他讲过很多事情。可惜这些话都没有遗留下来。只有一件事，我小时候，父亲经常提到。他说，孙中山先生有一次用手拍拍他的背肩，说：“要挺起胸来，不能驼背——成为东亚病夫！”我父亲也常敲我的肩膀，警告说：“要挺起胸来，不当东亚病夫！”

父亲崇拜孙中山先生，主要是崇拜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此，他是1925年时才由陈国咏（共产党员）介绍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的。他在《铁血男儿传》自序中也很明确地提到他是为了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而写作。以后国民党反共后，对于“三民主义”作了很多的解释。对此，他曾经有很“左”的愤怒的评语：“这不是三民主义；是三个狗屁！”

四、四次坐牢

父亲喜欢做新闻工作，他的后半生差不多一直搞报纸。1922年在宁波的《时事公报》当编辑时，镇海某县署捉获一名盗匪。经查，乃是镇海炮台司令张伯歧部下的士兵。父亲为此写了一篇短评，文中说：“兵化为匪，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短评刊出后，引起小军阀张伯歧的恼怒，要宁波镇守使王桂林查缉。王桂林就把父亲和《时事公报》社长金臻庠一同逮捕起来，约拘留了一个月，后经各方营救，才得保释。这是父亲第一次坐牢。这一时期，他开始认识到军阀制度必须推翻。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解放宁波。1927年3月父亲任宁波《民国日报》社社长。

1927年4月前后蒋介石就公开叛变革命。《周恩来选集》上卷有这样一段注释：“1927年3月20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宁波捣毁了市总工会和店员工会；4月9日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逮捕了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社长庄禹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宁波《民国日报》首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开火，刊登了该报编辑倪毓水写的《蒋介石犹效军阀故技耶？》和《王俊十大罪状》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宁、